

李旦初文集

1

抛砖引玉集／文学流派论

《李旦初文集》收录了李旦初教授于不同历史年代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学术论丛》、《诗刊》、《中华诗词》、《名作欣赏》、《光明日报》等报刊正式发表的文学评论、文学鉴赏、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现当代文学研究论文、剧本、诗词作品及已正式出版过的专著总计四百万字，按内容分为十二卷。

李旦初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李旦初文集

第一卷

抛 砖 引 玉 集
文 学 流 派 论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旦初文集 / 李旦初著. -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4. 12

ISBN 7-80208-063-0

I. 李… II. 李… III. ①李旦初-文集②文学-作品综
合集-中国-当代 IV. 1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2008 号

李旦初文集 / 著者: 李旦初

书 名 / 集王羲之字

责任编辑 / 邓中好 华 夏

创意策划 / 李琼华 李利华 李珍华 崔前应 郑鹏飞 张 宇

激光照排 / 张海涛 刘海霞

封面设计 / 耀午书装 装帧设计 / 嚶鸣斋

出版发行 /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 (100733)

印 刷 / 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889×1194 1/32

印 张 / 161.79 印张 字数 / 3500 千字

版 次 / 2004 年 12 月 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 1-2000 册

书 号 / ISBN 7-80208-063-0/I·010

定 价 / 620 元 (全 12 卷)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电话: 010-65369521

李旦初文集序

田本相

一

我和旦初有缘。

八十年代初,我编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看到旦初的《五四新诗流派初探》一文,洋洋洒洒,才华横溢,颇有创见。于是,写下我的审稿意见,力主发表。虽未谋面,却已神交。1981年,我们在一次鲁迅学术会议上见面,彻夜深谈。知其人生坎坷,命运多舛,屡遭劫难;但令我敬佩的是,他天性乐观,性格倔强,一身豪气,一腔热忱,活生生的一颗压不垮打不烂的“铜豌豆”。

其后,二十多年间,间或也有书信往还,但天各一方,各忙各的。直到今年五月,他的儿子华夏也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的下落,将旦初文集十二卷带来,嘱我为之写序。我想,我和旦初确实有缘。

我情愿为他的文集写下我对他的感慨、尊敬和友谊。

二

为文作序,不仅是论其文,更在于论其人,对于旦初尤其如此。

他生于一个号称地主,但却贫困的家庭。十一个兄弟姐妹,只有他一人,不但读了小学,而且读到初中,进而上得师范。一方面,是靠其父亲独具慧眼,给予格外的栽培,还在于旦初好学上进。十二三岁,家乡安化,无高中可上,他硬是一个人步行两天,到益阳投考师范,以极好的名次而考中。在校得到老师的厚爱。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大潮中,又考进武汉大学中文系。他满以为从此可以学业有成,前途无量。但是,等待他的却是一连串的厄运。

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他，温煦着祖国春天的阳光，承受着共产党的恩情。他入了团，更追求入党。就在大学一年级，他又一次郑重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成为一个党的积极分子。也就在这一年，党号召鸣放，党组织信赖他，邀请他这个积极分子参加鸣放座谈会。他以一颗赤诚的心，精心准备，热情地提出意见，列举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主张“教授治校”等；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些意见竟然成为他的“反党言论”。本来他还不一定成为右派的，但是，他自幼养成仗义执言，拔刀相助的性格。他为著名的教授程千帆定为右派而鸣不平。这样，他很快也被定为右派。

尽管，他在校期间，摘了帽子。他哪里知道，这个右派的帽子实际上是摘不掉的。

大学毕业，这位江南学子，被派往塞外的榆次。榆次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放逐流犯的地方。

旦初是一个敢于面对厄运的人，他的性格就是勇于向命运挑战。他几十年如一日，独守着这塞北的风雪，顽强地活着。

三

文革中，一个摘帽右派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旦初被下放到柳林插队。

此刻，他已经结婚，而且又有了四个孩子，全家挤在一间茅舍里，真可谓家徒四壁。一张大炕，就是全家的栖身之地了。冬天，不知寒气从何处钻进来，八面透风；夏天，一到雨季，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雨过天晴后，屋里还在滴哒。全家人只好站着。

他穷得丁当响，但是，他还精心给孩子做玩具，乐呵呵地活着。

和他同来柳林的晋中剧团的支部书记贺登朝，看他有学问，讲义气，直率爽朗，于是成为好朋友。当老贺接受改编晋剧《三下桃园》的任务后，就拉上旦初这个笔杆子，旦初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戏剧创作。

旦初是那么认真,那么投入,先后七易其稿,原作已经面目全非,最后定名为《三上桃峰》。在县里上演后,它以一股清新之气,赢得观众的欢迎。县上演了,地区争着改争着演,地区演了省里也争着改争着演,于是,《三上桃峰》成了一个香饽饽,都想把它捞到自己手里。偏偏把旦初这个执笔者,甩得远远的。此刻,旦初心情是极为平淡的,怎么署名,怎么改,悉听尊便,他也躲得远远的。

谁知“四人帮”怀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将《三上桃峰》打成所谓“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一时间,成为在全国批判的对象。此刻,《三上桃峰》就成为烫手的山芋,随时可以引爆的地雷了。旦初这时又被人记起,拉出来成为替罪羊。那些官僚们对着“四人帮”说,《三上桃峰》之所以出笼,完全是由于“用人不当”,自然就把旦初这个摘帽右派扯出来。追查下来,自然他又成为重点审查对象。

原作《三下桃园》的题材,的确和王光美去桃园“四清”有关。但是,当追问旦初,《三上桃峰》是否源自《三下桃园》时,他为了保护县的干部,一口咬定此剧同它无关,他说他从来不知道还有个《三下桃园》。即使在这样危难的时刻,以他的右派身份,还在顶住高压,为他人着想,这就是旦初的为人之道。

在地区举办学习班时,当权者企图转移视线,他们把矛头指向贺登朝,在大街上张贴大字报,刷大标语,点贺登朝的名,施加政治压力。此刻,依然显出旦初的义气和机智,由他执笔写了《〈三上桃峰〉的写作经过》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引来无数的观众。这张大字报报道了此剧出笼的真实情况,向群众宣示:虽然此剧最初是由县里编演的,但是后来地区、省上竞相上演,他们都有不能推脱责任的。这样,就使得地区一些领导不敢再施加压力,收敛了气焰。再一次显示旦初那种临危不惧、敢于承担的作风。因此,而得到朋友、同志的尊重。

四

旦初,是一只埋没草莽的“湖南牛”。

打倒“四人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放改革的大好的形势和风气，给旦初带来一个大显身手，释放潜能的历史机遇。

他的“右派”问题终于平反了，落在他身上的种种罪名，也随之烟消云散。但是，正在这时，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病逝了，旦初一边带着正在上中学和小学四个孩子，一边全身心投入到科研与治学中，以施展才能，在学术领域里实现自己的抱负。

在文革中，他的为人已经得到吕梁地区某些领导人的赏识，当他们诚恳地邀请他出来担任中共吕梁地委秘书长时，被他婉言谢绝了。旦初志在学术。他不作官，一心要做教师，一心要做学问。这在吕梁，一时传为美谈。旦初，就是这样一种淡薄名利的人，他永远追求是他自己的理想，遵循的他自己的人生原则。

最后，他仍然不能摆脱，被任命为吕梁师专的校长。

的确，他是那种只要给他一个支点，就可以使整个地球转起来的人物；他有一股创造的精神，一种为了达到目标百折不回的毅力。

他有魄力，有识见；他知道办学最重要的条件是教师，于是，他把那些散落在吕梁山沟角落里才有才能的“右派”，想尽各种办法调到师专来，使吕梁师专成为人才汇聚的地方；他想尽各种办法提高教学质量，他身先士卒，带头搞科研，带头编讲义，带头教学；他还想尽各种办法提高教师的待遇，就在他的校长任上，定下了为每个教师提高三级工资的制度；而他自己却连一个办公室都不要，躲在自己的宿舍里办公。

在全省的师专统考中，吕梁师专连续三年夺得头筹；可以说震惊全省：“哪里冒出着这么个学校来”！一向教育落后的吕梁，飞出了“金凤凰”！

于是，他很快被省里看中，调他到山西的第一高等学府——山西大学，担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实际上是校长。

五

就在他担任吕梁师专校长的同时，他开足了马力向科研进军。

他要把丢失的时间追回来,在繁忙的行政事务和紧张的教学,中,他挤出时间,潜心治学。三更灯火五更鸡,几乎把全部生命都投入他所向往的著书立说的创造境界。

作为学者的旦初,是十分感人的。

在偏远的吕梁山区,几乎没有做学问的条件,资料的匮乏自不必说,而学术信息的闭塞,也带来困难。

他不但没有为这些困难所吓倒,而且以其深厚的文艺理论功底和学术敏感,把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的重点放到流派的研究上,抓住了一个具有学术价值和创新潜能的领域。

多少年来,在“左”的文艺思潮的掌控下,以政治标准作为唯一的评价作家作品尺度,发展到文革时期,现代文学只剩下一个鲁迅了。哪里还有不同流派和不同风格作家和作品的地位。正是在这样背景下,他一连推出《“艺术首先是艺术”——创造社前期文艺思想重评》、《五四新诗流派初探》、《左联时期同“自由人”与“第三种人”论争的性质质疑》等长篇论文,在王瑶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这批论文得到专家的好评,受到现代文学界的重视。首先,它敢于冲破禁区,提出一些大胆的具有创意的见解;其次,在学科领域里具有先锋的性质。可以说,旦初是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中最早开拓流派研究的学者。

此后,他一发而不可收。不断开拓和深化其流派研究。由现代文学流派研究到当代文学,再到古典文学流派的研究。他成为国内文学流派研究的专家。

在当代文学流派研究中,旦初对于山西的“山药蛋派”的研究情有独钟,写下了一系列研究文章。旦初作为一个湖南人,在苦难的时代,在山西最贫苦的地区度过他最苦难的日子,而扎根下来,成为一个地道的“老西子”;而在学术研究上成为一个“山药蛋派”研究专家,我以为这是十分了不起的。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山西。他不但同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成为朋友,而且与许多山西的本土作家、

诗人成为至交。他为他们的作品写下了不少热情的评论。

对于古典文学流派的研究,也颇多创见。《诗经》中有流派之分,是早已有定论的;但是,旦初又深入地将其划分为雍和典重的“雅颂派”、深于讽刺的“小雅派”和刚健清新的“国风派”;同时又将《国风》区分为多种地域性流派。其他如对于古典散文流派的研究,骚体诗派的研究都有所推进。

而他为了深化流派研究更从理论上加以探索,如《文学流派溯源》等。对于流派的概念,中外流派理论的历史发展,细心地加以梳理,深入地溯本求源。

本来,他决心完成《中国文学流派史》的研究项目,但是终于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只写出《中国新诗流派》一书,作一了结。对于旦初来说,自然是一大憾事,这自然也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我不可能历数他治学的成就,但由他主编和参加执笔的中国师范专科学校的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是值得一提的。国家教委特地聘请他担任主编,可见旦初在学术界的地位。在他的主持下,终于编成一部为同行所公认的适合师专教学特点并具有较高学术含量的优秀教科书。

六

他毅然告别了吕梁,来到太原。甚至他都做好了牺牲学问,在山西大学大干一场的准备。他,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事业心的的人,到哪里都梦想着创造,创造一个新天地,创造一个新境界。

但是,他的梦很快就破灭了。由于某种不可抗拒的原因,在一场政治风波之后,他被免职了。

其实,他是有跳脱的空间的。但是,他不是官僚,他更没有半点官场的经验。像以往一样,他承担了全部,肩起了一切;他历来都是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人。

他失去的是一个大学校长,虽然不是十分显赫但却也是一个为

人看来值得炫耀的地位；而得来的却是学生、老师、朋友和同志的大爱戴和大尊敬。

这一切，就足以使他得到人生的最大的慰安了，为此，他感到人生的幸福。这才是他所追求的人生真谛。

他赋闲了。对于有的人，可能因此一蹶不振。但是，对于旦初，却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他的生命永远是自由的，舒展的；哪怕独居斗室，也可以尽情驰骋！

想不到吧，山西少了一个大学校长，但是却多了一个诗人！

在十二卷文集中，竟有四卷是旦初的诗词集：《嚶鸣斋诗稿》、《嚶鸣斋诗稿续编》、《嚶鸣词》、《历史名人题咏》。这些诗篇，绝大多数都是在他“赋闲”的日子创作的。

在这些诗篇中，是生命的自由的呼唤，是灵魂的热烈的燃烧；是人生的沉思；是理想的渴求；是奋斗的诗篇；是浪漫的交响；也是哲学的睿智！

所有这些，都写在儿时回忆，山水漫游，回归故里，论诗品词，将军崇拜，名人题咏之中。广阔的题材，激情的翱翔，心灵的激荡，思想的驰骋，这里，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一个无垠的世界！

七

最令我折服的，也是出乎的我的意料的，旦初竟然成为一个钓者。

我从来没有钓过鱼，但是我却佩服钓者。他们是那么投入，忘情山水之间。是那么钟情，如青春的恋爱；是那么专心，如专家沉醉于实验室。旦初说：如果明天到一个新的地方钓鱼，则激动得彻夜不眠，心儿早已飞去。一旦进入垂钓的境界，静静地守候着，观察着鱼标的动静，几乎忘记了一切，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饥饿，真是一个天人合一的境界。

他在《钓趣绝句四首》中道出他的钓趣：

计议明天去钓鱼，
眉飞色舞兴何如？
夜阑辗转床铺动，
一梦乘舟到太湖。

四面青山映碧潭，
风和日丽染晴岚。
天然美景何暇顾，
垂钓悠悠兴味酣。

钓饵金钩布阵奇，
凝眸两目识天机。
归来恍惚烟波里，
但见浮标上下移。

杆横水面意何如？
睡眼朦胧卧太虚。
梦入庄生奇幻境，
翩翩彩蝶是飞鱼。

但他并非要做隐士，也并非是闲情异志，同样是旦初对一种人生境界的追求。请看第九卷《烟蓑雨笠集》，他确有那种皓首穷经的精神，他去探求古代钓者的精神世界。为此，他从《诗经》翻检起，沿着历史的顺序，甚至连《四库全书》都翻个遍，选出中国历代钓鱼诗的精品。篇篇加注，首首赏析。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国文人的精神的一个侧面，也集中地看到中国诗的一个独特的领域。无疑，这是旦初一个贡献。也许，我孤陋寡闻，至今我还没有看到一本这样的钓鱼诗选。它不仅贡献了一部中国钓鱼诗选，更贡献了一个当代钓者的人生境界。

旦初，永远都在追求，即使钓鱼也成为他蓬勃生命的律动。

八

我喜爱《旦初文集》，我愿意向当代的青年人推荐这部文集。

这里，所写的不仅仅是所谓的知识学问，而是写出一代知识分子的奋斗的精神足迹。

有人说，五六十年的知识分子是驯服的一代，我不赞成；作为旦初的同代人，我敢说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是共和国的忠实的建设者保卫者，他们是奋斗的一代。在《旦初文集》中，我们既感受着他命运的坎坷，人生的苦难；但是更感受到一种挑战命运的精神和不屈服于苦难的奋斗意志。

近年来，我也看到个别的中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自传，它让人们误以为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就象他那样的操行，以为他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精神。我不能说，他是历史的小丑，但也不允许他们冒充英雄。我以为《旦初文集》可以让人，特别使青年人由此而识别出那些“冒牌货”！

最后，让我再一次郑重地向读者推荐这部《旦初文集》！

2005年7月10日于京东罗马嘉园

田本相，天津人，1932年生，1964年南开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原评委。主要著作有《曹禺剧作论》、《曹禺传》、《郭沫若史剧论》、《田汉评传》等，主编了《曹禺全集》、《郭沫若戏剧全集》、《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等。现为中国话剧文学研究会会长。

目 录

“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

——创造社前期文艺思想重评 (1)

左联时期同“自由人”与“第三种人”论争的性质质疑
..... (23)

五四新诗流派初探 (45)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简介 (73)

当代三个文学流派比较研究发凡 (94)

相依为命的“三姐妹”

——当代三个文学流派比较研究之一 (111)

名极其妍的“三枝花”

——当代三个文学流派比较研究之二 (118)

评台湾现代主义诗潮的得失

——台湾新诗流派蠡测之一 (141)

开放精神与民族特色相融合的意向

——台湾新诗流派蠡测之二 (153)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理论发展梗概 (160)

文学流派溯源 (179)

论臧克家的流派归属 (205)

在《讲话的旗帜下》

——五战友与山药蛋派 (221)

论河汾诗派的形成及其社会背景	(234)
从流派角度论文艺的乡土化	(250)
《诗经》风雅颂的流派分野	(269)
雍和典重的“雅颂派”	(283)
深于讽喻的“小雅派”	(293)
刚健清新的“国风派”	(305)
《国风》的地域性流派	(314)
先秦散文的流派划分	(327)
玄深美富的“老庄派”散文	(337)
峻峭犀利的“申韩派”散文	(351)
铺张扬厉的“苏张派”散文	(360)
骚体诗派的形成和流派特色	(368)

“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

——创造社前期文艺思想重评

一

五四时代作为“异军突起”的创造社，曾被人们看成提倡“艺术至上主义”的“艺术派”。创造社的作家们对这顶帽子颇为反感，并曾多次申辩，但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 和支持。建国以来出版的一些新文学史著作，虽然不再认为创造社是“艺术至上派”，但在论述创造社前期文艺思想时，仍然不适当地夸大了它所受的“唯艺术论”的影响，以至把它的一些合理内核当作“唯艺术论”而加以摒弃。就连一九七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唐弢同志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也不例外。

《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第一章第三节讲到创造社前期文艺思想时写道：

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自己“内心的要求”，这正是初期创造社文艺思想的核心……与此有关，他们崇“天才”，重“神会”，讲求文学的“全”与“美”，宣传艺术“无目的”论，这些自然表明他们确曾受过“艺术至上”思潮的影响。（第 54 页）

第三章第一节论述郭沫若的早期文艺思想时，又写道：

在诗歌理论上，他强调直觉、灵感的作用，主张“自

我表现”的感情的“自然流泄”，这些也都是出于个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对于诗歌创作的要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反对封建传统和封建载道文学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把诗歌看成纯粹的自我表现的手段，忽略了它的社会意义，则可以明显地看出艺术论思想的影响。（第 137—138 页）

接着，在介绍了郭沫若一九二四年“稍有系统地接触和认识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又写道：

在政治思想较快发展的同时，郭沫若这个时期的文艺思想则仍然表现了相当的程度的复杂性……他一时又未能摆脱资产阶级纯艺术论思想的影响，在阐述诗歌的特征和浪漫主义创作要求的时候，往往混杂着文艺无目的和非功利的主张。（第 140 页）

可以看出，编著者力图对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前期文艺思想作出一分为二的评价，既肯定其积极因素，又指出其消极因素，因而采取了“一方面如何如何，但另一方面又怎样怎样”的论述方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创造社前期的“这些理论主张自然是含混而且充满着矛盾的”（第 55 页）。

诚然，创造社前期的文艺思想是复杂而矛盾的。这种矛盾，概括起来说就是：他们既强调文艺要为改造社会服务，又认为创作无目的、无功用。比如，创造社的主将郭沫若，一方面确认“任何艺术没有不和人生发生关系的事”，肯定“艺术家要把他的艺术来宣传革命”^①；另一方面又鼓吹“艺术的本身上无所谓目的”，认为“文艺本身也如春日之花草，乃艺术家内心之智慧的表现。诗人写出一篇诗，音乐家谱出一个曲，画家绘成一幅画，都是他们天才的

^① 《艺术家与革命》，《郭沫若文集》10 卷 76 页。

自然流露：如一阵春风吹过池面所生的微波，应该说没有所谓目的。”^① 创造社的核心成员，主要从事理论批评的成仿吾，在他一九二三年五月写的《新文学之使命》这篇文章里，一方面十分强调文学“对于时代的使命”，鼓动文学家“把住时代，有意识地将它表现出来”，主张对旧社会“要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另一方面却又声言“文学上的创作，本来只要是出自内心的要求，原不必有什么预定的目的”，提倡“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学的全 Perfection 与美 Beauty”。创造社另一个核心成员，小说方面的代表作家郁达夫，一方面主张以文艺“来促进改革这不合理的目下的社会的组成”；另一方面又提倡“以唯真唯美的精神来创作文学和介绍文学”^②。如此等等。同时，也无可讳言，创造社前期的确受过“唯艺术论”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正是他们的文艺思想之所以存在矛盾的原因之一。问题是我们如何解释这种复杂而矛盾的现象。如果不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对它的实际内容进行具体的分析，而只是简单地、笼统地用所谓“唯艺术论的影响”来加以说明，那么，有许多问题就无法得到解答。比如，创造社这一群受“五四”新思潮洗礼而具有特别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反抗精神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作家，何以竟会竭力鼓吹艺术无目的、无功用的特点？他们既然主张“艺术无目的”，为什么写出来的作品却又具有那么鲜明的目的性？难道说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是可以截然分开的吗？又如，在他们的文艺论文中，那种自相矛盾的说法何以竟然表现得那么明显，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既强调文艺的时代使命和社会作用，又认为创作本身无目的、无功用？难道他们的思维逻辑果真混乱到这般地步吗？如果说根据创造社的文艺论文中说过一些关于艺术“无目的”之类的话就可以断定他们主张“为艺术而艺术”，那么，为什么郭沫若在明确提出了“我们的文艺只能是革命的文艺”的主张之

① 《文艺之社会革命》，《郭沫若文集》10卷33—84页。

② 《创造日宣言》，1923年7月21日创造日。